

CHUNQIU ZHANGUO SHIREN YU ZHENGZHI

王长华·著

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UNQIU ZHANGUO SHIREN YU ZHENGZHI

王长华·著

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 王有为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傅惟本

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

王长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联合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190,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557-6/K·618

定价 15.00 元

序

吴 泽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先后迅速发展，政治军事上出现五霸七雄之争；特别是广大士人阶层，顺应社会历史的巨变，更有儒、墨、道、法百家争鸣，显示着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空前的生机和活力，为后代学者们所尊崇、敬慕，引起持久的憧憬和热烈研究的兴趣。

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发生如此急剧的社会变革，我们在注意其社会经济这一重要的基本因素研究的同时，自必注意社会政治思想因素，特别是其中有关当时社会上士人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对这次急剧社会变革所起影响的研究。因此，以往，在春秋战国史的研究中，自然地会引发起有关士人研究的种种话题。就近代来说，在 60 年代初期，顾颉刚先生在其《史林杂识初编》一书中，就有题为《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专文，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专门讨论中国古代士人问题的较早著述。到 80 年代中期，围绕此一论题，又有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和刘泽华的《士人与社会》，先后面世。至此，有关中国古代史中之士阶层这一课题的研究，引起当前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近几年来，正在不断地开拓深入，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论题范围。当然，士人问题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尚处草创阶段，其中涉及不少前人所少为涉及过的新问题，如果能下功夫深入钻研下去，

一定能开拓出新的局面来的。

王长华同志原是我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他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史论》，以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主攻方向，做了许多前人所没有深入探索过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工作。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变过程，重点从纵向上讨论儒、墨、道、法四家士人与政治的发展与演变，从横向上比较山东与秦国士人对待政治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造成的不同政治结果，写成这部二十万字的专著。这篇学位论文在评审、答辩时，曾得到前辈专家学者们的肯定评价，现在经过作者一年多的修改，即将出版，相信它是会受到读者们的欢迎的。

作为这本论文的指导教师和最早的读者，我对它所作出的成就是肯定的。我认为这部专著多有独到之处。首先，是它把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士人，在思想文化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士人关心政治的结果，但是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士人关心政治有关。因此，以士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立论，正抓住了春秋战国士人精神的关键。其次，是它选择学术史角度展开问题。正象作者所界定的，本书中讨论的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士。研究文士与政治的关系，其切入点在学术思想，从学术思想清理、学术史发展角度入手，在结合其生平事迹考察的基础上，给予士人以社会角色定位和政治立场还原，这在方法上是妥当的，也是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的。再次，是它的区域政治文化比较。从全书的结构看，其中对儒、墨、道、法四家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描述属于纵向开展。在第五章中，作者把山东士人和秦国士人与政治关系进行比较，又立意要作区域

间横向的平行比较研究,这是一个新颖的框架设计。不仅如此,在我国先秦史研究中,要进行这种区域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确是个新课题,难度是较大的,但我相信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探讨,会引起读者们的注目和兴趣的。

春秋战国这段复杂多变的历史,自古以来,为历代先秦史家们所关注、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又提出士人与政治关系这一新课题,独辟蹊径,难度较大。王长华同志在这部专著中,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和缜密的笔力;但,这项新课题,毕竟涉及面广,富有独创性,书中有些论述不免显得粗疏,如:兵家与政治的关系,春秋战国政治对士人施加影响的确切情况及变化等,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好在作者对此已有认识,这就是此后改进、提高的基础。我在此殷切希望他今后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科研成果。时代在前进,学无止境,王长华同志的这部专著有所疏误处,还请史学界和广大读者们费神检验,多多教正。

1997年3月于沪西丽娃河畔怡然斋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士人崛起的历史因缘	2
二、新格局下的新需要	7
三、基本思路与方法.....	10
第一章 儒家士人与政治	14
一、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	15
二、驻心穷达 超越穷达.....	29
三、纳道义原则入历史现实.....	48
第二章 墨家士人与政治	70
一、权威再建与唯利是求.....	71
二、后学演变及其政治命运.....	90
第三章 道家士人与政治.....	107
一、“事天”与“治人”	107
二、方内人的方外营造	123
三、“治人”的新进路	144

第四章 法家士人与政治	156
一、亲疏贵贱一断于法	158
二、势、术两翼的突进.....	177
三、簇拥在现实政治的麾下	188
第五章 东西士人与政治关系比较	209
一、议论与参与	210
二、走进政治权力中心	228
三、两种选择路向及其结局	245
结 语	261
后 记	265

绪 论

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出现在统一格局之后的“乱”世。所谓“乱”是指周王朝自西周初年以来的严密统治开始被打破,礼乐征伐渐次由天子而诸侯,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家臣,这一时代特征史称之为:礼坏乐崩,王室衰微。然而,也就是在这一“乱”世之中,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却因此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士阶层的崛起和活跃,更是这一时期历史的重大变化和重要收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士人阶层的崛起与活跃,遂使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也因此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从整体上增加了深度和魅力。

围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阶层和士人群体,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实在很多,所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就笔者目力所见,学术界已刊布的重要研究成果,前有从历史演进角度讨论古代士之起源的顾颉刚先生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①,近年来又有从文化史角度立论的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②,和从社会史角度展开讨论的刘泽华先生的《士人与社会》^③相继问世。前圣和时贤的诸多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士人研究的广阔思路,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取镜的借鉴。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研究,特别是对先秦士人研究仍有可置喙

者。我们认为,从官府散入民间,而又从民间回到官府,是春秋战国士人从整体上展现出的一个历史走向,也同时是他们共同走过的一段心路里程。在这个历时性的行进过程中,暗含着的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共时性问题,那就是士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不绕弯子、不兜圈子,径直以此一问题立论,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学派士人由点到面的描述和分析,同时兼采前圣和时贤的方法与思路,就可以作到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立体地展示和说明春秋战国士人在这二三百年间所经历过的精神流程,并且透过士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理想和现实立场选择的变化,映现那个时代的政治变化及其后果。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论题的真实想法所在。当然,选择讨论问题的基点虽与前人不同,但讨论的展开却仍然不得不从最基础性的问题入手。

一、士人崛起的历史因缘

追溯古代士的起源,顾颉刚先生断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的说法所指陈的,仅仅是一个大体可信的事实轮廓,且不说由“武”向“文”的变迁需要作更细致、充分的论证,即使仅仅证成古代之士起源于武士,也需要更为可靠的文字训诂根据。据古文字学者的考证,士字构形所像为武器,其初义表示兵刑,并引申为职掌兵刑的身份官称。西周金文及先秦文献记录有职掌兵刑狱讼的官称为“士”或“司士”,用的就是士字的最初语义。士作为掌兵刑狱讼的官名的语义进一步引申,就成为担任官职者的泛称。春秋金文中常见“诸士”、“士庶子”等,“士”即泛指任官者。

士既为官称，遂演变为官爵。由初义表示兵刑，到引申为掌刑狱的官称，并进而演变为官爵名，这是士字语义在先秦时代的演进历程。此外，士字还有三种语义：一是军士，二是男子之称，三是有才能者的通称。这三种语义在西周至战国的金文中也可找到证据^④。

与士字语义的演进相类似，士在西周至春秋末年的历史变迁中，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顾炎武曾说：“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士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⑤春秋以前，周王朝中的有职之士，或担任武士以保卫社稷，如《晏子·内篇·谏下》说：“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吏，如《国语·周语上》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韩诗外传》则说：“大夫擅官，士保职。”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在周王室中供职的士就有宫正、宫伯等几十种之多，而《周礼·地官·司徒》所记士在基层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名目之多就更难胜数了。上述两项之外，还有一部分士是担任了卿大夫的邑宰和家臣，为卿大夫管理采邑和家族的，这也是于史有征的历史事实^⑥。

从上述士人任职的情况看，不管是担任保卫王室职责的武士，还是担任王室及诸侯的行政职事，以及做卿大夫的邑宰和家臣，就其任职的性质而言，无疑都属于服务性的。在宗法制度严格的西周社会里，任职的这种服务性自然与士本身在宗法秩序中的附属性处境有关，而士人的附属性处境又内在地成为其任职服务性的根据，这是当时士人生存的外在限制之一。外在限制

之二,由于士主要担任自上而下各级官方机构中的职事,限于职业的需要,士人所学习和掌握的也必须是实用化、工具化的知识。为配合这种需要,周王朝的官方士人教育培养方式为,“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⑦杨宽先生更认为:“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被限定在周王室贵族的生活范围之内,学习和掌握非常实用的、工具性的技能,来为王室和大贵族服务,这就是自周代初年至春秋年间士人存在的基本社会定位,庶几也是人们把士作为贵族系列中最低一档的理由。

不用说,西周王朝对于士人,从教育培养到选拔任用都是按部就班形成制度化的,由王朝一手包办的,也就是说,作为教育培养机构的“辟雍”和“泮宫”是周王朝政治机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培养出的人才也是通过“论定,然后官之”^⑨,直接成为王室或诸侯国中方方面面的职事官吏的。由此可见,从周代初年到春秋中期,士人的培养和任用,从头至尾都是官办的。然而,进入春秋末年,士人培养和任用的官办局面开始被打破。很显然,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来自于政治。由于周王朝自周平王宜臼元年(公元前 770 年)东迁以后即开始式微,而从鲁僖公九年(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确立霸主地位起,到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3 年)越国北上灭吴建立霸权终,这近二百年间诸侯的数番攘夺更使周王朝的统治渐趋于名存实亡了。这一旧有政治格局和统治秩序的崩析和瓦解给当时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而它带给士人的则首先是原有制度化的士人培养和任用方式的被迫中断,官学培养下的

士人地位明显开始下降,官学的命运也差不多走到了它的尽头。特别是葵丘会盟时制定的盟约中针对“士”的条款明显地苛刻了:“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⁹⁹由此而产生的影响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就在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东方小国郑国的学者郑子到鲁国进行朝拜,在朝拜过程中,郑子表现出了对历史和礼仪制度远超出鲁国本土人士的博闻和精识,据载:“仲尼闻之,见于郑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¹⁰⁰《论语·微子》篇所谓:“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虽然还无法完全断定此一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但如果说它大体发生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初年当不致于太错,而它所透露出的的确也是官学四散的消息。周室衰微,官学四散,给士人阶层带来的问题是双重性的,即它既切断了周王朝提供的任职机会和俸禄来源,使世袭、兼摄等具体可见的政治、经济依靠变为全无凭借、全无依附;同时,士人又在失业之后被推进市场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更大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困难和机遇同时降临在士人面前,这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新政治变化发生之际所首先带给士人们的,士人们必须对此作出抉择。

诸侯壮大、权力下移对周王朝产生的威胁是致命的,与之相联系,士人也因此割断了自身与周王朝之间的连结脐带。显而易见,士人在失去周王朝的政治、经济依靠之后,生存问题便自然成为当务之急。这其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士人仍然保有官职禄位之外,其他大部分士人则必须重新选择出路和生路。由此,士人的求生之路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受教育较低、修养较差者,他们不免流为庶民,或充当社会侠客,或投于新贵门下做起食

客。另一种士人因为受过较高的教育,拥有六艺等传统文化知识,在失去官守后,便自觉成为读书人、学者。他们靠钻研学问、聚徒讲学,既据此以维持生存,也因此而传播思想,成就事业。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士人,就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后一种士人,这是需要在这里予以明确的。当然,以读书、为学为职业的士人并不能囊括春秋战国士人的全部,但是这部分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由他们的思想、行为所显示的风格和倾向,适足以映现和代表那个独特的时代。在这些以聚徒讲学、传授知识和思想为职业的士人中,著名者如郑国的壶丘子林、邓析,而在鲁国,孔子和墨翟的学术活动更蔚为壮观。史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⑩墨翟则“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⑪随着求学人数的增多和学术影响的增大,以孔子为开山鼻祖的儒家和以墨翟为第一代巨子的墨家竟成为轰动一时的“显学”。而伴随这种钻研学术、聚徒讲学活动的展开,士人们也开始独立思考上下古今、天地人间的种种问题,并把这些思考逐一书之于竹帛,从而形成为不同学派的不同学说。

王室衰微、权力下移,从而使士人与宗法秩序和王朝政治渐次脱钩,这是春秋末年士人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的外缘,而士人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知识和技艺修养又是士人崛起和勃兴的内因。如果没有这个内因,面对时代机缘,士人所作出的恐怕会是另一种选择。如果没有时代提供的机缘,士人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艺恐怕也永远只能作为为王室和贵族服务的资本和工具。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因与缘的历史际遇,却共同奏响了士人生存新时代的序曲。如果略去若干过于冗长、过份琐碎的历史细节,从长时段、远视界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历史巨变对于

士人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促使他们游离出旧有的等级秩序和从过去的氏族血缘桎梏中解脱出来^⑨,而更为重要和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士人由身份的自由而随之带来的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他们在眼前的历史境遇下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自由地选择职业,同时也可以自由地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从根本上讲,春秋末年以前士人所具有、所擅长的知识和修养仅仅成为自身服务于他人的工具和手段。而现在,以往的手段变成了目的,过去被工具化了的知识和修养又真正回归到了它自身。以思想和学说为维持生存的重要资本,也同时以此为精神创造和价值追求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这是春秋末年士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二、新格局下的新需要

春秋末年士阶层的独立和崛起,其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士人自身的往日形象,也同时因此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世俗影响,特别是一向被认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事生产的文士的地位变化和影响尤其引人注目,竟发生所谓“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⑩的巨大轰动效应。据《吕氏春秋·知度》载,这一事件发生于赵襄子(公元前474—公元前425年)生活的时代。此后(约公元前430年),中牟人宁越弃农从学,“十五岁而周威公事之”^⑪,以“鄙人”之身、布衣之士,终于靠为学而成为王侯师。此类事件在当时的发生或许还不致于太过普遍,但它无论如何也是信而有征、极有说服力的例子^⑫。由这一事实来看,士人在脱离了原来的封建附

属地位,由随贵族之后而成为四民之首以后,其独立性明显增强,自由度明显扩大,随之,社会影响力也日见其大起来。士人影响力的扩大,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由社会地位独立而带来的能动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与新的历史格局下新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有关。这后者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前者,并决定着前者的运行、变化及发展方向。

应该说,自春秋五霸开始,列国间的争霸战争就已经奏响了诸侯争夺天下的序曲。随着战事的频繁和争夺的日渐深入,人才问题越来越成为霸主间争胜的关键,所谓“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⑧。“尚贤者,政之本也”^⑨的观念正是那个时代诸侯对人才渴求的反映。此时诸侯的日趋坐大标志着他们已由过去周王朝的政治派出机构渐渐演变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体组织,机构的复杂和严密使其对职事官僚的需求远超过从前,这一点成为士人渐受诸侯们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因为士人既有知识技能,又有思想见解,其在诸侯的内政外交方面常常能够发挥他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这又使诸侯们不得不加倍重视士人,利用士人的特有才能,以为诸侯安邦和争胜增加筹码。所以,时至战国初年,在各诸侯国中,礼贤下士普遍形成风气,布衣卿相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其中著名者如魏文侯之重用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并且“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⑩。鲁缪公任公仪休为相^⑪,臣子柳、子思^⑫。燕昭王师尊郭隗,后招致苏秦、邹衍、乐毅、屈景从四面八方“归燕”^⑬。更有甚者如齐国自齐威王时开办的稷下学宫,前后竟招纳当时著名士子如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多人,并且“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⑭。如此等等,各国君主的招贤纳士,或直接委士人以政治重任,或养士以立楷模于国人^⑮,其尊士重士的方式

虽不甚相同,但希望因此而收到政治利益、获得政治效果却不能不说是各国诸侯们的一致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统治者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需要士人的切实合作,希望士人也力所能及地配合这种要求,对此他们表现出相当一致的倾向。而对不予合作的士人,有些执政者也不免提出严厉的批评和训诫,如鲁国的阳虎就曾批评孔子的“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为不仁、不知^⑧,以敦促孔子尽快出仕为官,为当局政治献策尽力。有的执政者对“不业”的士人竟赤裸裸地以杀戮相威胁,如赵威后问齐使云:“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⑨这位被孟子称之为齐国士人“巨擘”^⑩的陈仲子,因有高名而坚持不与统治当局合作,竟深为握生杀之权的统治当局所深深忌恨了。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政治对士人的需求程度和统治者对士人的需求心理了。很显然,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对士人的需求和任用,已与周王朝在此之前给予士人的待遇大不相同了。再有,进入春秋末年以后,不仅各国诸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和待遇方面与周王朝的工具性使用不同,而且士人对其自身的社会定位及存在价值的认定也与以前大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士人随着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开始自觉地将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化乃至本体化,也就是说,他们开始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凭着自己的知识、学问和思想与当下政治清醒地保持着某种距离,并有意和政治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对峙。这就是颜闾之所以敢于同齐宣王争尊^⑪,子思之所以敢于对鲁缪公友而不师深表不满的原因所在^⑫。后世史家常将此称之为道统的确立。